

《印度-伊朗人的起源》评介^{*}

邵会秋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 (Andronovo cultural unity) 是欧亚草原青铜时代分布最为广泛的遗存之一。从南乌拉尔到中国的新疆、从叶尼塞河到中亚南部的绿洲都有相关的文化遗存分布。长期以来, 该类遗存一直受到欧美考古学者的广泛关注。2007 年, 俄罗斯著名考古学家爱莱娜·库兹米娜 (Elena E. Kuzmina)《印度-伊朗人的起源》^[1]一书的出版为我们全面了解境外安德罗诺沃遗存的发现和研究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这本著作是库兹米娜女士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叶出版的俄文专著的增补版^[2], 也是她几十年考古工作的重要总结。在书中她以考古学为基础, 综合了语言学、文献学、民族学和人种学等大量的相关资料, 给读者展示出了公元前 2 千纪草原地区青铜文化发展的动态画卷。该书的出版不仅推动了草原青铜时代考古研究的深入开展, 也有助于我们对新疆地区出土安德罗诺沃遗存的分析和研究。鉴于此书的重要性, 本文将介绍书中的基本内容, 并以此为基础对其中一些国内学者较为关注的问题进行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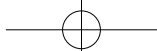
—

《印度-伊朗人的起源》一书共 763 页, 文中引用的专著近百本, 论文近 3 千篇, 另附有地图 18 幅, 线图 114 张, 如此巨大数量的引文足以显示出库兹米娜女士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学术功底。全书分四部分, 共 26 章。

1. 第一部分: 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 (第 1~1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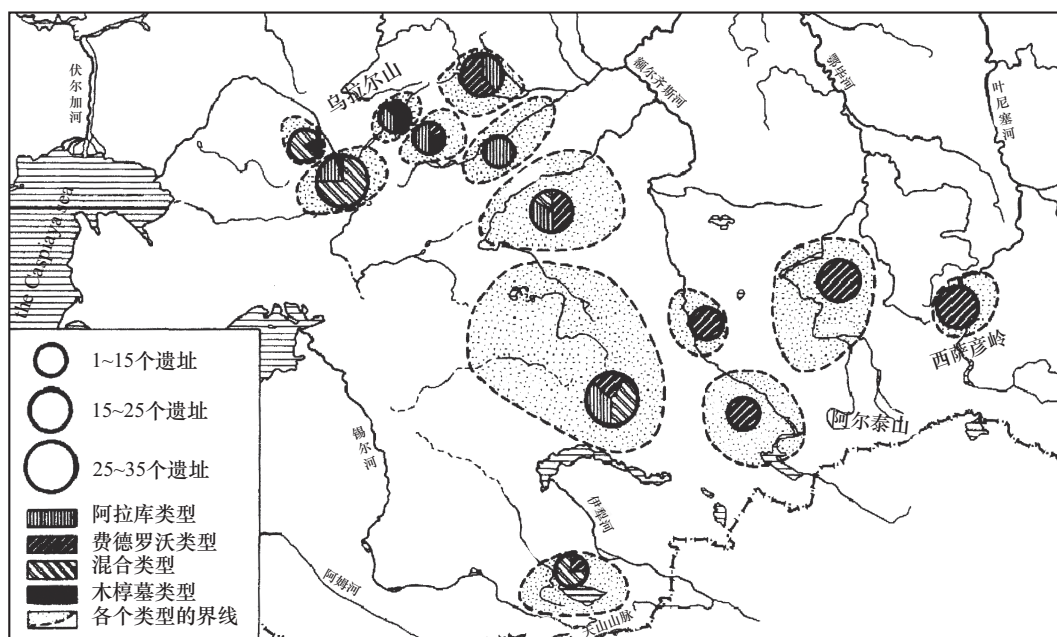
首先作者对安德罗诺沃遗存的研究历史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并对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讨论。而后文中以考古学材料为基础, 对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各个方面做出了总结和分析。涉及的内容包括遗址分类和文化联合体的主要特征、聚落和房址、陶器、冶金业、服饰、交通、经济、人种和埋葬习俗等, 让读者对整个安德罗诺沃遗存有较为全面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北亚与欧亚草原考古学译丛》(项目号: 12&ZD152) 中期研究成果, 并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项目号: 12CKG006) 的资助。



的认识。这些内容既是第一部分的研究重点,也是全书比较研究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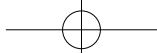
库兹米娜女士在文中讨论了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与一般考古学文化的区别,她认为之所以将这些遗存放在同一系统中讨论是因为“这些遗存的文化特征能与其他遗存明显的区分开,而他们所组成的这一文化联合体是紧密相连的文化动态系统,是在特定的区域内组成的持续不断的链或网络”。她使用类型来区分文化联合体之下不同的遗存,其中重点介绍和分析了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中的彼得罗夫卡类型(Petrovka)、阿拉库类型(Alakul)、费德罗沃类型(Fedorovo)、阿塔苏类型(Atasu)和七河类型(Semirech'e)等7个主要的地方类型的分布、基本特征和年代等问题(图一)。



图一 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文化类型分布图

(引自库兹米娜《印度-伊朗人的起源》地图11)

在这些考古学研究基础上,作者讨论了印度-伊朗人的起源和安德罗诺沃人群的归属问题,她认为印度-伊朗人起源于欧亚草原地区而不是古代的近东地区,他们与草原地区的木椁墓和安德罗诺沃遗存相关,最主要是与安德罗诺沃人群相联系。这个推论是贯穿整本书的一个中心思想,也是作者最想表达的观点。在书中库兹米娜从点点滴滴中建立起安德罗诺沃人群与印度-伊朗人的联系。除了考古学的证据外,她还列举了人种学、语言学、地名学以及神话和艺术等多方面的证据。其中在对装饰艺术的比较中,库兹米娜谈到了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与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的关系,她认为东部的费德罗沃类型与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联系密切。最后还专门探讨了印度-伊朗人与芬兰-乌戈尔人(Finno-Ugric)和希腊人等其他族群集团的联系。



2. 第二部分：中亚地区部落的迁徙及他们的文化（第 15~22 章）

在这一部分作者主要阐述了公元前 2 千纪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在中亚地区的迁徙和扩张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与之存在联系的诸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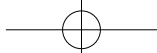
在公元前 4~3 千纪的中亚地区各地基本上是被绿洲农业文化人群和湖泊附近的渔猎经济文化人群所占据的，已知的文化包括里海南部的纳马兹加 I~V 期文化（Namazga）、咸海地区的凯尔特米纳文化（Kelteminar）以及塔吉克斯坦地区的希萨尔文化（Hissar）等等。而到了公元前 2 千纪，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向南和向东的扩张和迁徙对这些地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在南部绿洲农业文化的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体（Bactria 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简称 BMAC）遗存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以安德罗诺沃为代表的畜牧人群扩张存在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辛塔什塔-彼得罗夫卡阶段（公元前 2 千纪初），第二个阶段阿拉库类型、费德罗沃类型和二者混合类型时期（公元前 15~前 13 世纪），第三个阶段木椁墓晚期和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晚期（公元前 12~前 9 世纪）。作者认为虽然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在中亚出现的时间较早，但是主要的扩张和迁徙发生在公元前 2 千纪下半叶。而且不同地区文化与之发生联系的时间并不一致。

在第 20 章，库兹米娜女士专门讨论了安德罗诺沃人群与中国新疆以及中原地区的关系。这部分的主要内容作者也曾多次单独发表过^[3]。与其他欧美学者一样，作者也认为殷墟的冶金、轻便马车和马的驯养都是比较成熟的状态，其原始状态来源于草原地区。她认为正是伴随着安德罗诺沃人群的扩张和迁徙这些东西传入中原地区，而中国北方地区人群起到了中介作用。同时她还强调新疆与草原的联系在青铜时代就已经建立，安德罗诺沃人群也是这种联系的主导者。在书中作者对新疆发现与安德罗诺沃遗存相关的陶器、战斧、凿、铲、镞、铜镜和耳环等铜器进行了细致的对比分析，认为新疆地区安德罗诺沃遗存的发现体现了三种不同形式，即物品交换或贸易、冶金工匠移动和人群的迁徙，联系最活跃时期发生在公元前 13~前 9 世纪。由于作者对新疆地区的相关资料（尤其是近些年发表的资料）缺乏深入的了解，未能做出更为详细的分析。

3. 第三部分：印度-伊朗人不同分支的起源（第 23~25 章）

库兹米娜首先梳理了已有的大量的关于印度-伊朗人起源的成果，并重点分析了目前比较流行的几种观点。她指出目前整个学术界针对这个问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分歧，但是大多数俄罗斯学者认为印度-伊朗人来自北方，而且安德罗诺沃人群属于印度-伊朗人的猜想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支持。

而后作者分别讨论了印度达尔德人（Dards）、阿富汗努里斯坦人（Nuristani）和印度雅利安人（Indo-Aryans）的起源。通过分析她认为这三个不同分支的人群都与安德罗诺沃人群迁徙和扩张相关。但是他们来源的具体路线存在着区别，达尔德人和努里斯坦



人是从巴克特里亚北部地区迁徙过来,本身已经融合了部分农业人群,因此他们主要是定居农业,使用轮制陶器。而印度雅利安人是从北面直接南下的人群,保留着发达的畜牧经济。同时也说明安德罗诺沃人群在不同地区扩张也采取不同的方式,在 BMAC 地区的安德罗诺沃人群放弃了传统的畜牧经济,而适应了当地的绿洲农业经济,与当地的农人和平相处,而在印度西北部地区的扩张则是具有破坏性的,取代当地的哈拉帕文化(Harappa),仍然保持着发达的畜牧经济。作者还认为印度雅利安人从印度西北还迁徙到整个印度,但是并没有考古学上的证据,只是引用了部分语言学和人种学证据。

4. 第四部分:伊朗人的起源(第26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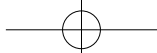
在该部分首先介绍了木椁墓文化联合体(Timber-grave cultural unity)的研究史,作者强调木椁墓文化联合体是与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并行发展的一个文化联盟,主要分布于东欧草原和森林草原地带,流行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8~前12世纪,这个文化的人群是伊朗人的前身。在公元前14~前12世纪,由于生态和经济危机,导致大量的木椁墓人群南下,通过高加索地区和土库曼斯坦到达伊朗地区。随后库兹米娜女士讨论了青铜时代末期草原上的文化,主要是各地出现的以附加堆纹陶器为代表的遗存。在公元前2千纪末草原温度降低,引发了生态危机,在很多地区都发生了人群迁徙,草原畜牧人群正经历着巨大的变革,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联盟。斯基泰文化(Scythian)和萨卡文化(Saka)等早期游牧人群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在历史的舞台。

在第四部分作者讨论了西部伊朗人、东部伊朗人以及中亚地区等不同支伊朗人的起源问题,还重点分析了斯基泰联盟的形成问题,归纳了斯基泰文化的各种器物的主要特征及其来源。

除了上述四部分内容外,在附录中库兹米娜女士对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绝对年代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近些年的¹⁴C测年数据与库兹米娜的年代判定并不一致,要比她的结论早300~500年。因此对于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绝对年代问题也是库兹米娜非常困惑的重要问题之一。但即使如此,她认为这些¹⁴C数据年代跨度很大,完全依据其测年结果在判定年代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坚持自己之前的结论: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第一阶段(彼得罗夫卡类型时期)年代在公元前18/17~前16世纪,第二阶段(阿拉库和费德罗沃类型时期)年代在公元前15~前13世纪,第三阶段(附加堆纹陶器文化时期, the Applied-Roller Ware Culture,也有人称之为“valikovaya pottery”)公元前13/12~前9世纪。不过,最后她还附上了已有的¹⁴C测年数据,让读者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的区别,也显示作者严谨的态度。

二

前文我们介绍了《印度-伊朗人的起源》一书的主要内容,这本著作涉及的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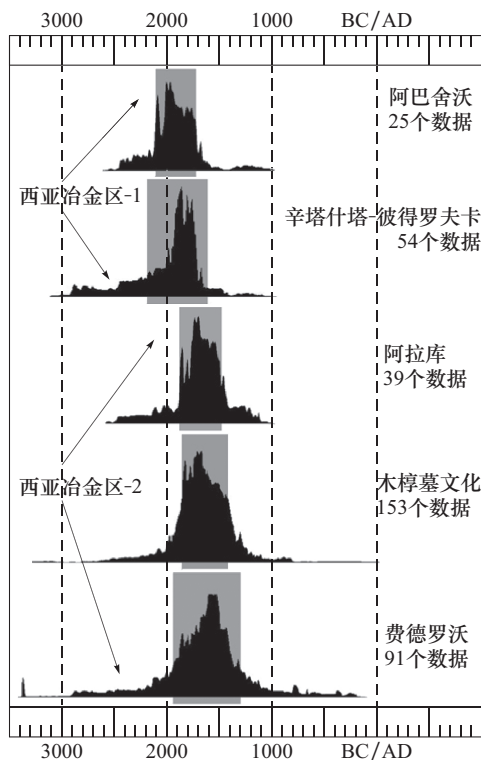
多,资料数量巨大。但作为考古学家,库兹米娜女士的研究仍然是以考古学为基础,对于其他学科的论断大都是直接引用已有的研究成果。书中考古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和与之相关的文化的研究上,因此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也主要与这些内容相关,尤其是其中一些与中国考古学联系较为密切的问题。

1. 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分期与年代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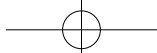
库兹米娜认为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作为一个大的系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彼得罗夫卡类型为代表,年代与辛塔什塔文化相近,在公元前 18/17 ~ 前 16 世纪;第二阶段,以阿拉库和费德罗沃类型为代表,年代在公元前 15 ~ 前 13 世纪;第三阶段以多支流行附加堆纹陶器的文化为代表,年代为公元前 13/12 ~ 前 9 世纪。在书中她将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之下划分了多个不同的类型,现在很多学者把这些类型都直接称为文化,例如阿拉库文化、费德罗沃文化等^[4]。虽然学者在对具体遗存的称谓上存在着不同观点,三个阶段的发展相对顺序还是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但是在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绝对年代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争论。

按照库兹米娜的论述,她的绝对年代判定是根据与周邻地区文化的比较并结合早期的 ^{14}C 数据而得出的,实际上这个结论基本上也代表了 20 世纪大多数俄罗斯学者的共识^[5]。但是近些年来草原地区新测定了大量的 ^{14}C 数据,这些 ^{14}C 数据的结果对传统的绝对年代系统冲击非常大,很多文化的年代都被大大地提前了^[6]。以切尔内赫(E. N. Chernykh)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都据此改变了之前的结论,切尔内赫认为第一阶段(彼得罗夫卡时期)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22 ~ 前 18/17 世纪,第二阶段(阿拉库和费德罗沃时期)在公元前 20 ~ 前 15 世纪,第三阶段(附加堆纹陶器文化时期)年代主要集中在公元前 2 千纪后半段。

虽然所测的 ^{14}C 数据越来越多,但实际上这些数据所显示的年代跨度并不一致。图二是草原地区所测的 ^{14}C 数据的示意图,面对这些数据想要得到一个清晰的年代范围并非易事。不同学者都会面临对数据的取舍问题,因此据此所得的结论也并不一致。就连切尔内赫也不得不承认“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



图二 草原青铜时代中晚期 ^{14}C 数据年代示意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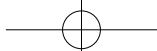
几个考古学文化的年代数据分布状况要糟糕得多。阿拉库文化的数据分布图尤其难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对数据库中资料的复查无疑是必需的。与木椁墓文化相比,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 ^{14}C 年代要更加模糊”^[7]。因此, ^{14}C 数据的模糊性也是库兹米娜坚持自己原有判断的一个重要原因。

既然 ^{14}C 数据的年代范围很模糊,那么我们应如何判定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绝对年代呢?虽然这个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更多的证据,但是在这里我们想提出一点线索。在东部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中流行一种喇叭形口的金属耳环,根据已有的发现,这种耳环最早出现在第二阶段的费德罗沃类型中,主要流行于东部地区的第二阶段的费德罗沃类型和第三阶段遗存中(图三,1~7)。类似的耳环在中国新疆(图三,8~12)和北方地区都有发现(图三,13~18),这种器物也很早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林沅先生曾提出中国北方地区出土的喇叭形口耳环可能是来源于哈萨克草原的安德罗诺沃文化^[9]。研究欧亚草原考古的美国学者艾玛邦克(Emma C. Bunker)女士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她认为不仅是喇叭形口耳环的东传,早期金器的使用也是在公元前2千纪下半叶由非商人群从中亚引入到中原的^[10]。但是库兹米娜并不赞同这观点,因为根据她的研究,费德罗沃类型年代在公元前15~前13世纪,而中国北方地区的喇叭形口耳环出现的年代在公元前2000~前1600年,要早于草原地区^[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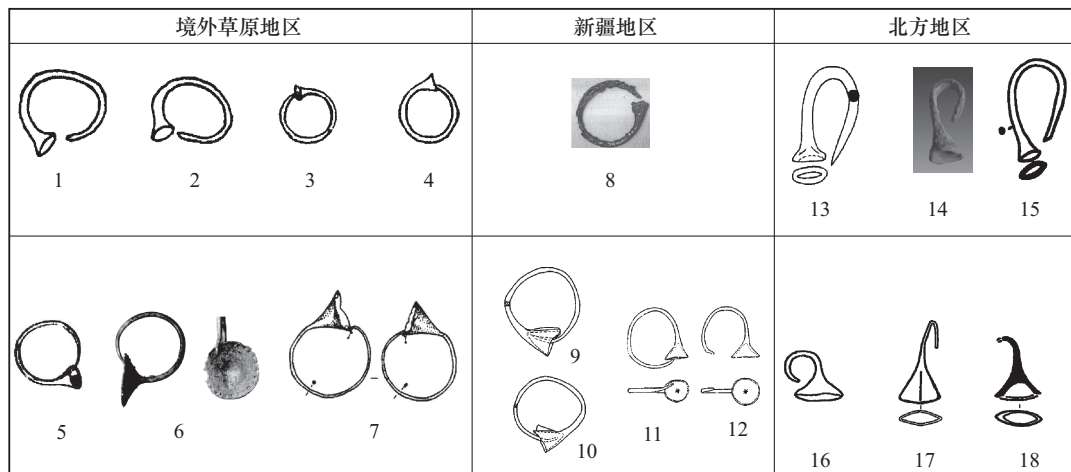
这种广为流行的喇叭形口耳环在中国北方地区发现数量少,也不见明显的演变轨迹,而在新疆和境外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中发现数量多,分布广,因此我们赞同中国北方地区的喇叭形耳环与安德罗诺沃联合体有关。不过,不同地区同类器形制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中国北方地区流行喇叭形口耳环主要都是扁口的,整体呈钩形(图三,13~18),而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虽存在扁口的,但绝大多数的喇叭形口耳环是圆口的,而且耳环整体也呈圆形(图三,1~12)。对于这种现象的原因,我们推测安德罗诺沃系统的这种耳环在最初的形成阶段,可能不存在着固定的形制,种类比较丰富,有管状口的,也有扁喇叭形口和圆喇叭形口的,由于相距较远,中国北方地区人群只是在这一时期借鉴了这种耳环的制作方法和形状,自己在当地生产制作了喇叭形耳环。而安德罗诺沃人群在发展过程中最终更青睐于那种圆喇叭形口的耳环。

中国北方地区最早的喇叭形口耳环大都出自青铜时代早期文化中,在四坝文化、齐家文化和夏家店下层等文化中都有发现,这些文化的年代范围大都相当于中原的夏至早商时期,而且这些耳环可能还出自这些文化的晚期阶段。以西部四坝文化为例,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喇叭形口耳环出自干骨崖墓地(图三,13)。根据已有的学者研究,干骨崖墓地处于四坝文化的晚期^[12],最新 ^{14}C 测年数据显示该墓地年代范围在公元前1850~前1500年^[13]。同样在齐家文化中发现的喇叭形口耳环也出自该文化较晚的磨沟类型中^[14]。因此虽然我们无法明确北方地区最早出土耳环的具体年代,但这些耳环绝对年代应该不会晚于公元前2千纪中叶。

另外,在书中库兹米娜并未对喇叭形口耳环的形制发展演变进行专门的讨论,但从



该书图 33（安德罗诺沃装饰品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喇叭形口似乎存在着一定的发展趋势，在第二阶段费德罗沃类型中，喇叭形口较小，而到第三阶段喇叭形口变大。即耳环喇叭形口由小变大。在对比了中国新疆和北方各地的材料后，我们可以得到进一步的佐证，新疆的喇叭形口耳环主要出自阿敦乔鲁墓地^[15]、下坂地墓地^[16]和汤巴勒萨伊墓地^[17]，其中从年代上看，阿敦乔鲁墓地的年代最早，其耳环的喇叭形口也要小于其他两个墓地（图三，8～12）。中国北方地区虽然出土的喇叭形口耳环均为扁口，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类似的规律，在年代较晚的平谷刘家河^[18]和迁安小山东庄^[19]等地出土的喇叭形口耳环口部明显大于较早的四坝文化、齐家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同类器（图三，13～18）。而且从作者已知的资料看，喇叭形口耳环中环部较细的标本似乎出现的年代都较晚。不过，由于笔者对境外出土的喇叭形口耳环资料收集并不完整，因此本文对喇叭形口耳环发展的论述只是一种推测，尚需更多的资料来佐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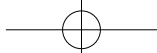


图三 各地出土的喇叭形口耳环

- 1、2. Dun Bei 3. Kupukhta 4. Dzhartas 5. Tash-Tyube 6. Rublevo VIII 7. Dzham 8. 阿敦乔鲁
9、10. 下坂地墓地 11、12. 汤巴勒萨伊墓地 13. 干骨崖墓地 14. 临潭磨沟墓地^[20]
15. 阜新平顶山 16. 平谷刘家河 17. 彰武平安堡 18. 迁安小山东庄

从上面的分析看，库兹米娜女士关于安德罗诺沃绝对年代的结论与喇叭形口耳环的传播年代存在着矛盾，如果按照中国出土的喇叭形口耳环的年代看，她的年代判定似乎有些晚，但是由于整个草原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总体¹⁴C数据的考察并不理想，我们又该如何确定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绝对年代呢？

由于综合草原各地¹⁴C数据结果却并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而且结论也比较混乱，因此在这里我们想单独参考一下俄罗斯米努辛斯克盆地的数据，之所以选择米努辛斯克盆地是因为这个地区很早就建立比较完善的文化序列，这里的安德罗诺沃遗存相对单纯，均属于费德罗沃类型，而且与哈萨克斯坦中部和东部地区的费德罗沃类型年代相



近,其绝对年代数据的范围也相对清晰一些。根据近些年的 ^{14}C 数据^[21],米努辛斯克盆地的青铜时代文化序列大致如下。

阿凡纳谢沃文化:公元前 $3000\pm 90\sim$ 前 2520 ± 30 年

奥库涅夫文化:公元前 $2520\pm 30\sim$ 前 1715 ± 65 年

安德罗诺沃文化(费德罗沃类型):公元前 $1715\pm 65\sim$ 前 1420 ± 40 年

卡拉苏克文化:公元前 $1420\pm 40\sim$ 前 830 ± 2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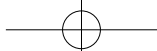
从这些数据看,以费德罗沃类型为代表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第二阶段,绝对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800~前1400年,这个结论与喇叭形口耳环的传播年代相符,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年代范围。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并未存在于米努辛斯克盆地,但考虑到草原地区后来的早期游牧文化出现时间主要在公元前8世纪以后,因此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第三阶段可能与卡拉苏克文化基本同时,年代在公元前1400~前800年。而对于第一阶段不少学者认为与阿巴舍沃文化和辛塔什塔文化年代大体一致,可能在公元前22~前18/17世纪,我们也并没有其他的意见。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目前得出的一个大致年代范围,实际上不同地区的文化流行年代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其中一些文化的实际的年代跨度可能要比这个范围短一些。

2. 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Seima-Turbino)与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关系

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是欧亚草原青铜时代考古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很多学者对此类遗存都进行过讨论,其中最全面的研究成果是切尔内赫等人著的《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一书^[22]。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最有特色的是其青铜器遗存,这些青铜器可以分为两组:一组包括叉形矛、空首斧、无柄的匕首和柄端装饰有动物纹的青铜刀,这组青铜器在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中分布最为广泛,而在其他文化遗存中非常少见,也就是塞伊玛-图尔宾诺最具特色的铜器;第二组器物包括有銎战斧、有柄的匕首、銎杆不分叉的矛、锥和凿等器物,这组青铜器在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中数量较少,但在草原地区的木椁墓文化和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中更为流行^[23]。

目前对于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的年代范围存在着争论,早期的研究都认为这类遗存与安德罗诺沃遗存的第二阶段阿拉库类型和费德罗沃类型相当或稍早,绝对年代范围在公元前16~前15世纪^[24],但是近些年来,随着辛塔什塔和阿巴舍沃文化 ^{14}C 数据的公布^[25],很多学者把草原青铜文化的绝对年代大大提前了,美国学者胡柏(Lousia G. Fitzgerald-Hubert)在1995年就将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的年代向前推到公元前两千纪初^[26],切尔内赫也不例外,在最近的著作中他也完全否定了之前自己和其他多位考古学者关于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绝对年代的结论,他认为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的年代与阿巴舍沃和辛塔什塔文化年代相当,依据新公布的 ^{14}C 数据将其年代定在公元前22~前18/17世纪^[27]。

库兹米娜在书中也对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进行了讨论,但是对此类遗存的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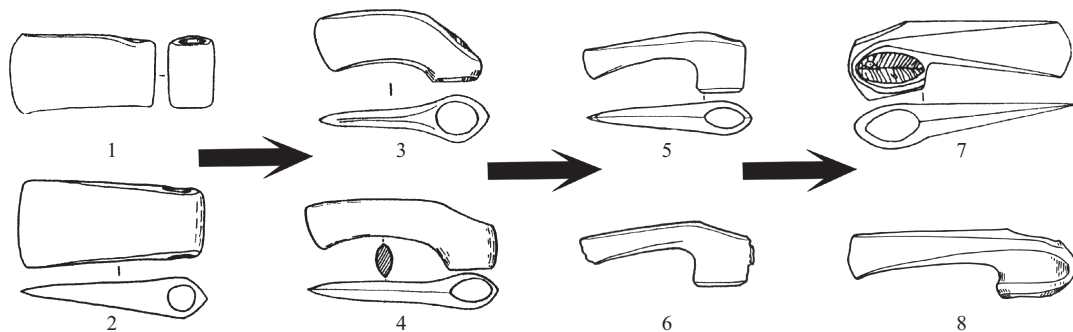


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她一方面认为塞伊玛-图尔宾诺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 22 ~ 前 18 / 17 世纪的结论得到广泛的认可,但另一面还强调该类遗存与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第二阶段的费德罗沃类型的联系。她认为从分布地域、锡矿来源以及动物纹装饰都显示了二者的密切关系^[28]。从这些论述来看,似乎存在着矛盾之处。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的是与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第一阶段同时,还是与第二阶段遗存时代相当?

目前将其年代定在公元前 22 ~ 前 18/17 世纪的学者都是认为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与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第一阶段同时。而笔者对此存在着疑义,原因有两个:

第一,¹⁴C 测年数据的使用上,目前用来判定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年代的数据都不是来自遗存内部的,而是参照阿巴舍沃和辛塔什塔文化的。而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中仅测定了四个¹⁴C 数据,其中笔者掌握的来自东区两个数据,一个是叶鲁尼诺墓地,年代在公元前 1680 年 ± 75 年;另外一个来自克罗维耶普里斯,年代在公元前 1610 年 ± 30 年。但这些数据因为零散不系统而被舍弃掉了,很显然这种舍弃的理由并不充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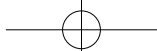
第二,实际上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青铜器无论从器型、质地以及青铜器铸造技术上看,明显要比辛塔什塔和阿巴舍沃文化更加成熟,而且最为典型的空首斧、叉形矛和青铜刀等器物也都不见于辛塔什塔和阿巴舍沃文化。另外,在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中出土有多件有銎战斧,虽然并不属于该类遗存的典型器物,但是对于我们和其他文化的比对分析具有一定的意义。笔者曾对欧亚草原地区的有銎战斧进行过专门的讨论,其中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中出土的均为欧洲系统的有銎战斧,这种战斧在草原地区有较为明显的演变^[29](图四)。



图四 欧洲系统有銎战斧的发展演变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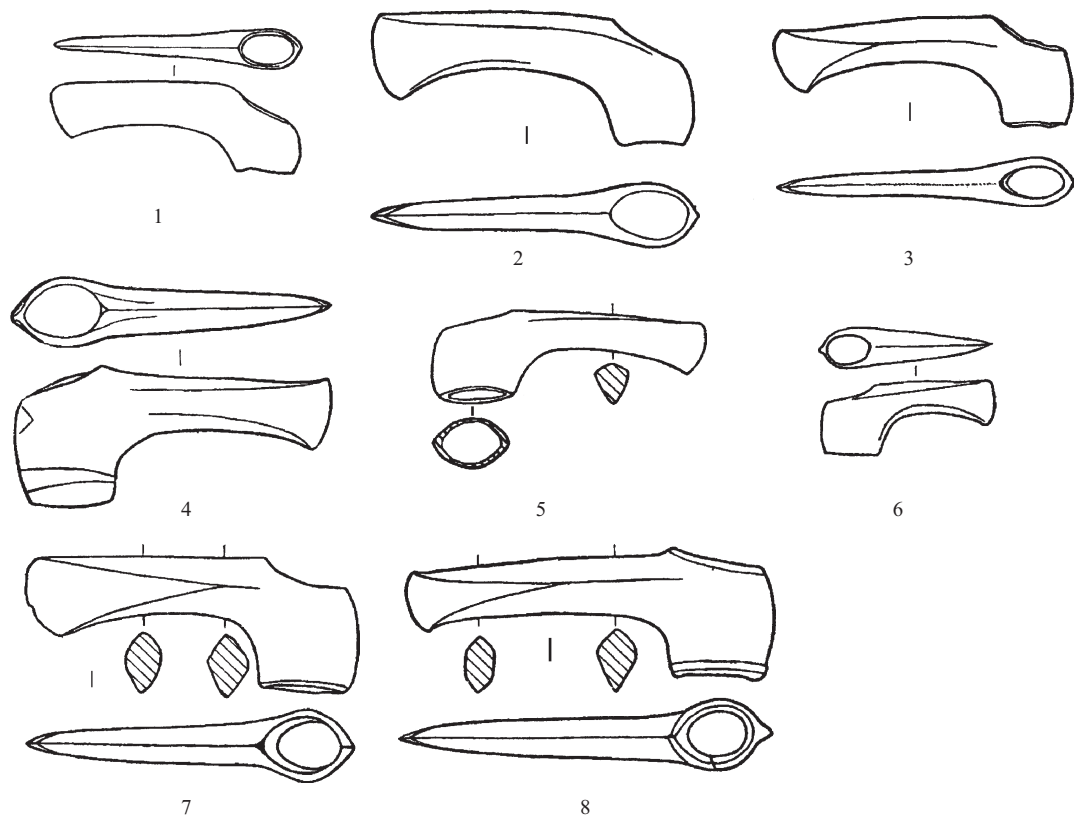
1. 竖穴墓文化 2. 迈科普文化 3. 波尔塔夫卡文化 4. 阿巴舍沃文化
5、6. 阿拉库类型 7、8. 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第三阶段遗存

而已发现的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有銎战斧至少存在着 8 件(图五),从具体形制上看,大部分都晚于阿巴舍沃文化的同类器(图四,4),而与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第二阶段的阿拉库类型有銎战斧形制最为相近(图四,5、6)。因此从这一点看,塞伊



玛-图尔宾诺遗存年代应该晚于阿巴舍沃和辛塔什塔文化的年代,而与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第二阶段年代大致相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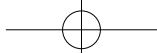
如果按照以上对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第二阶段的年代分析,塞伊玛-图尔宾诺的绝对年代范围则可能在公元前1800~前1400年。而这个年代与中国境内发现的塞伊玛-图尔宾诺青铜器流行年代也并不矛盾。



图五 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中的有銎战斧^[30]

1~3. 图尔宾诺墓地 4~6. 塞伊玛墓地 7. 穆尔济哈1号墓地 8. 索科洛夫卡墓地

库兹米娜在书中强调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与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东部地区遗存(费德罗沃类型)关系密切。但我们发现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东西区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东区的青铜器种类较少,且基本上都是该类遗存最典型的器物。而西区除此之外还有少量有銎战斧、平板斧、单刃刀、銎孔式矛和钩^[31]。这几种不同于东区的器物确是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常见的器物,说明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的西区与安德罗诺沃人群有较密切的联系。同时期安德罗诺沃东部地区的有銎战斧并不发达。从器物分析得知,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与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复合体,前者以有銎战斧为代表,后者是空首斧。这种差别是由其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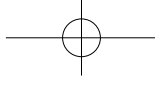
所决定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分布在广袤的草原，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则是分布于森林草原地区。在森林草原地区，砍伐树木需要安柄技术较高因而效率较高的空首斧，草原地带只是用简单的平板斧，刀也是简单的无柄双刃刀。两地战争使用的武器也截然不同，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有銎战斧是以砍杀为主的武器，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流行以刺杀为主的矛。从这两个文化的代表性器物的起源看，安德罗诺沃的有銎战斧是从欧洲逐步传入亚洲草原的，属于欧洲系统，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的空首斧不见于欧洲草原，是亚洲草原特有的器物，属于亚洲系统。

目前大多数国外学者十分强调早期金属时代欧洲草原向亚洲草原的扩张，但是这种强调如果超越了时空，则不符合历史事实了。欧洲草原金属器的出现要远远早于亚洲草原，但是到了青铜时代中期以后，亚洲草原在接受欧洲草原的影响之后逐渐产生出超越欧洲草原的青铜文化也是可能的，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就是一次短暂的文化超越。它的立兽刀无论从制作工艺还是艺术造型都是当时草原最耀眼的艺术杰作，而且它是后来亚洲草原的兽首刀剑的雏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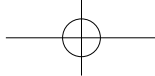
以上是笔者对《印度-伊朗人的起源》一书进行的初步介绍和讨论，实际上书中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的思考。当今中国考古学界有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草原考古，但是英文著作中系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所以，库兹米娜女士的这本著作尤其显得珍贵，而且该书无疑也为我们了解草原青铜时代考古提供了一把钥匙。

注 释

- [1] Kuzmina. E. E. *The Origin of the Indo-Iranians* [M].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 V, 2007.
- [2] E. E. Кутзьмина. *Откуда пришли индоиранцы* [M]. Моск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1994.
- [3] a. Kuzmina, E. E. Cultural Connections of the Tarim Basin People and Pastoralists of Asian Steppes in the Bronze Age [A].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C]. Philadelphia: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Publications, 1998: 63-93.
b. Kuzmina. E. E. Relation of the Andronovans with the Population of Xinjiang and Other Regions of China in the Bronze Age [A]. *欧亚学刊* (第七辑) [C].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1-28.
- [4] Ludmila Koryakova. *The Urals and Western Siberia in the Bronze Age and Iron Age*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5] Chernykh, E. N. *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6] a. Jochen Gersdorf, Hermann Parzinger, Anatoli Nagler. New Radiocarbon Dates of the North Asian Steppe Zone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the Chronology [J]. *Radiocarbon*, 2001(43): 1115-1120.
b. Evgenii Chernykh. Ancient Metallurgy of Northeast Asia: From the Ural to the Saiano-Altai [A]. *Metallurgy in the Ancient Eastern Eurasia from the Ural to the Yellow River* [C]. New York: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4.
- [7] Evgeny N. Chernykh. Eurasian Steppe Belt: Radiocarbon Chronology and Metallurgical Provinces [A]. *Anatolian Metal V* [C]. Bochum, 2011.



- [8] Evgeny N. Chernykh. Eurasian Steppe Belt: Radiocarbon Chronology and Metallurgical Provinces [A]. *Anatolian Metal V* [C]. Bochum, 2011: fig.20.
- [9] 林沅. 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 [A]. 边疆考古研究 (第1辑)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2: 1-12.
- [10] Bunker, E. C.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Tarim Basin Vicinity and Its Impact on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A].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C]. Philadelphia: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Publications, 1998: 604-608.
- [11] Kuzimina, E. E. Relation of the Andronovans with the Population of Xinjiang and Other Regions of China in the Bronze Age [A]. 欧亚学刊 (第七辑) [C].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1-28.
- [12] a. 李水城. 四坝文化研究 [A]. 考古学文化论集 (三) [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3.
b. 水涛. 甘青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结构和经济形态研究 [A]. 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 [13]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 酒泉干骨崖墓地的发掘与收获 [J]. 考古学报, 2012 (3).
- [14] 陈小三. 河西走廊及其邻近地区早期青铜时代遗存研究——以齐家、四坝文化为中心 [D].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2.
-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 新疆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 [J]. 考古, 2013 (7).
- [16]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疆下坂地墓地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2.
- [17]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尼勒克县汤巴勒萨伊墓地考古发掘报告 [J]. 新疆文物, 2012 (2).
- [18]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 北京市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 [J]. 文物, 1977 (11).
- [19] 唐山市文物管理处, 迁安县文物管理所. 河北迁安县小山东庄西周时期墓葬 [J]. 考古, 1997 (4).
- [20] 袁靖. 生业兴起——文明进程中的五谷、六畜、百工 [J]. 中华文化遗产, 2012 (4): 44.
- [21] a. Jochen Gersdorf, Hermann Parzinger, Anatoli Nagler. New Radiocarbon Dates of the North Asian Steppe Zone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the Chronology [J]. *Radiocarbon*, 2001(43): 1115-1120.
b. Gersdorf, J., H. Parzinger and A. Nagler. ¹⁴C Dating of the Siberian Steppe Zone from Bronze Age to Scythian Time [A]. *Impact of the Environment on Human Migration in Eurasia* [C].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4.
- [22] 切尔内赫, 库兹明内赫. 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 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 [23] 邵会秋, 杨建华. 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和空首斧的传布 [A]. 边疆考古研究 (第10辑)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 [24] Chernykh, E. N. *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15-234.
- [25] Anthony, D. W. The Opening of the Eurasian Steppe at 2000 BCE [A].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C]. Philadelphia: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Publications, 1998: 94-109.
- [26] Louisa G. Fitzgerald-Huber. Qijia and Erlitou: The Question of Contacts with Distant Culture [J].



- Early China*, 1995 (20): 18–65.
- [27] a. Evgenii Chernykh. *Ancient Metallurgy of Northeast Asia: From the Ural to the Saiano-Altai* [A].
Metallurgy in the Ancient Eastern Eurasia from the Ural to the Yellow River [C]. New York: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4: 25–30.
- b. 切尔内赫. 欧亚大陆草原带畜牧文化的形成过程 [A]. 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 塞伊
玛-图尔宾诺现象 [C].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251–268. (附文一)
- [28] Elena E. Kuzmina. *The Origin of the Indo-Iranians* [M].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 V, 2007:
178–183.
- [29] 邵会秋, 杨建华. 欧亚草原与中国新疆和北方地区的有銎战斧 [J]. 考古, 2013 (1).
- [30] 切尔内赫, 库兹明内赫. 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 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 [M]. 北京: 中华
书局, 2010. (根据图七十改制)
- [31] 邵会秋, 杨建华. 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和空首斧的传布 [A]. 边疆考古研究 (第 10 辑)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A Review on the Origin of the Indo-Iranians

Shao Huiqiu

The Origin of the Indo-Iranians is a monograph about steppe archaeology written by famous Russian archaeologist Elena E. Kuzmina and published 2007. On the basis of archaeological, in linguistic, philological, etethnological, ethnographical materials, the book has displayed a pictur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eppe zone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 This article briefly introduces the main achievements of the book and brought out my own opinions on the periodization and dates of Andronovo Cultural Unity, and the relations on Seima-Turbino and Andronovo Cultural Unity as well.

